

杜若鴻 著

柳永及其詞之論衡

文農



浙江大學出版社

柳永及其词之论衡

杜若鴻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 zjupress. com>)

责任编辑 钟仲南

排 版 星云光电图文制作室

印 刷 浙江良渚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16 千字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500

书 号 ISBN 7-900691-45-6 / I·06

定 价 28.00 元

序 一

柳永词的评价,在我国词史上一直争论不休,但柳永词的影响力,历久不衰,却是不争的事实。据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金主完颜亮读柳永《望海潮》,抵挡不住词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那种秀丽景色的吸引,兴起了渡江侵略南宋的念头,企图把杭州的湖山胜景,据为己有。这段千古“美谈”,我们无法肯定是否确有其事,但柳词在宋代的魅力,于此可见一斑。

这首柳词的魅力,经过了大约一千年,似乎没有丝毫衰减。现任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教授的梁丽芳博士,在本港接受中学教育时,偶然读到这首《望海潮》,“不知不觉就被那抑扬顿挫的音韵与风流俊雅的词采所吸引住了”,于是在大学毕业后,拜旅居加拿大的词学大家叶嘉莹教授为师,专门研究柳词,最后以《柳永及其词之研究》为题,提交论文,获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

无独有偶,《柳永及其词之论衡》的作者杜若鸿先生,也是因为被柳词深深吸引着而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虽然他最喜欢的是《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而不是《望海潮》。若鸿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毕业后,由于酷爱文学,毅然弃法从文,只身北上神州,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课程,有幸得到

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与吴熊和教授的高足——浙江大学沈松勤教授指导,经过数年埋头攻读,终于取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

对于柳词的优点,经过九百多年来论者的分析阐述,我们已有颇全面的认识;对于柳词的缺点,罗忼烈教授的传世之作——《话柳永》,为我们提供了精到深入的论析。若鸿的《柳永及其词之论衡》,兼收并蓄,把两方面的观点共冶一炉,评论权衡,作出中肯的判断。诚如答辩委员会专家们所评:“这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论文,从多学科的角度,全面探讨了柳永词在词史发展上的地位,以及其社会文化意义,视野宏通,论析细实,条理分明,有逻辑性,具说服力;论文还涉及词学研究的许多问题,有助于词学研究的深入,有学术价值。”本书是很值得一读再读的佳作。

邓昭祺

二〇〇四年六月一日于香港大学中文系

序 二

柳永是中国词史上最为著名的词人之一,对宋代及后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千百年来,关于柳永在文学史上的定位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至今仍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与苏轼词比较而言,研究者大多右苏而左柳,然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还是很值得探讨的。从词本身特点与影响方面说,“有井水处皆歌柳词”,说明柳词颇受公众的喜爱,其于词境的开拓,不仅功不可没,且可与苏轼齐驱,苏轼本人也是以柳永词作为竞争对象的。而苏轼的词,当时就有人非议,南北宋之交的李清照,又称其为“别体”。可见对柳永词原生状态的探讨及其地位的衡定,是学术研究领域极为重要的课题。

杜若鸿君以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进一步完善的专著《柳永及其词之论衡》,在解读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使这一学术前沿的课题得到了深化,选题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

全文创获之处颇多,标志着柳永词研究的一大进展。其特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论文在前贤研究柳永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从词学史的宏观流程中,衡定柳永词的地位,解决了柳永研究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重要课题。作者以为柳永是“词学史

上的第一座里程碑”，“革新词风的先驱者”，“贯通雅俗文学壁垒的桥梁”。

其二，从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民俗学和文学等多学科融合的层面发掘柳永词丰富的内涵。作者从文本展开，再经过以上多种维度的提升，达到较高的理论境界，最后再回到文本从事实证，使得自己提出的论点具有扎实的根基。这样的尝试，实则展示未来的文学研究方向。

其三，作者在论文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显现出厚实的国学根基。又对各种材料，尝试用多种方法进行归纳整理，如文中不少地方采用列表的方法，对柳永词作进行分类研究，对后人有关柳永的评论也通过图表进行对比研究，这些都会给予读者以启发。但作者并不以此为目的，而是作为一种手段，以概括柳永词的特征，挖掘柳永词的内涵，测定柳永词的地位为终点。

其四，对柳永词“原生状态”的阐述，更是本文的一大亮点。作者认为社会功能和娱乐功能是柳词生命力得以生生不息的源泉，而随着主体意识的深化，抒情功能变得突出。这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价值功用代表着词兼具雅俗文化阶层的风格走向。并从内容、形式、思想、风格等方面探讨“柳永热”现象的产生及其文化意义。

总之，杜若鸿君的论文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锐意创新，对柳永词的论述自成系统，且论证条理清楚，论点表述准确，体现出作者广泛的阅读面、宏通的理论视野与严谨的学风。作为一部学术论文，是极为突出的，也是非常优秀的。

杜若鸿君以前就读于香港大学，其研习柳词，源于对《八声甘州》的酷爱，继而积五六载之功，搜集资料，细大不捐，在

感性基础上细心体会,力求达到理性认识的高度。正值研习的关键阶段,又负笈北上,赴浙江大学入沈松勤教授门下,专攻唐宋文学三年,学业精进,成果颇丰。杭州为南宋故都,浙大称词学重镇,研究宋词者多以此为归趋。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首开风气,业师吴熊和先生又承先启后,使得这块基地既稳固坚实,又超迈前贤。沈松勤教授得夏承焘、吴熊和先生一脉真传,其所论著,能窥古今词学之堂奥。若鸿君以香港大学的背景入松勤教授门下,沐严谨之学风,聆精卓之宏论,加以三载精研,并几经增删,写成这部专著,颇堪嘉赏。

因为评阅论文的关系,我是若鸿君论文的最早读者之一,加以亦承吴熊和先生教诲,故而与若鸿君亦称有缘,因略述数语以为序。

胡可先

二〇〇四年六月六日于浙江大学中文系

序 三

词与曲,本皆“里巷歌谣”,“管弦冶荡之音”,和今天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性质无二。但曲能够成为“戏曲”之载体,与演员在舞台上的念、做、舞、打结合,表现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和情节生动的故事;而词却乏此功能,仅可一度保持“清唱”的形式,未得进一步发展为“剧曲”,促成具有浓郁东方色彩、在世界艺坛上独树一帜的中国戏曲早日诞生。那是什么缘故?

我在讲授“元明戏曲”课时曾提及这一问题。而答案是:两者均与文人的积极投入有关。

在宋代,文人介入“词”创作,使之变俗为雅,渐褪民间口头文学的“本色”,久之,遂慢慢弱化以至最后丧失其歌唱性,与音乐分离,变为只可“目验”而不可“耳赏”的案头书面文学,最终成为以“长短句”为特征的格律诗的一体。但反之,元代文人介入“曲”创作,不惟不令其丧失固有之“土气息,泥滋味”,反更如虎添翼,火上加油,助其达至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甚至无音声、口吻不可模仿,词俗而意雅,因而真正达到雅俗共赏的妙境。职是之故,这种具有本色美、自然美、传统美的文艺样式便终可成为戏曲之“载体”,担当起“剧曲”的重任,在舞台上表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替各种不同身份、性格、经历、怀抱的角色抒情达志,倾诉心声。而词则无此可能。

由此便引发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既同是由文人介入，为何两者的结果竟如此南辕北辙？答案是：这和时代环境密切相关。

宋代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惟有读书高”的时代，更诚如本书所言，是“儒家思想伦理空前高涨”，强调“务本向道”的时代，故文人士大夫无不自觉不自觉地以儒家“诗教”规范写作，就算偶有“越轨”，也大都遮遮掩掩。在此时代氛围下，文人介入词创作，自然令其“雅化”、“诗化”，成为与平民百姓生活脱节的“雅文学”，最后终陷于“僵化”（以吴文英词为极端代表）。

但元代则不然。由于统治者曾长期废科举，又厉行民族歧视政策，令汉族文人仕进无门，沉沦失意；而城乡经济繁荣，通俗文化大为发达，各地舞台林立，多种民间演艺广受社会各界的欢迎，这一“市场效应”为杂剧的繁兴提供了动力，失意文人为求出路，不少遂成为“书会才人”，参与散曲、杂剧创作，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在发挥自己所长的同时，亦可一抒其愤懑。既然饱读圣贤经典无用，而城乡民众才是主要的“米饭班主”，在此“大气候”笼罩下，儒学地位不免趋于式微，儒家“诗教”的影响力、约束力自然也就大大降低，传统价值观念、审美标准出现重大改变，不必“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于是，文人不再以“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标准规范创作，不以“深美闳约”、“柔婉含蓄”作歌辞艺术美之极则，而是本乎人性，倾吐胸臆，做到措词口语化、内容生活化、情感刻露化，以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感心悦耳、激起共鸣为致力目标。洵如徐渭所云：“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南词叙录》）只有那样的作品方能配合艺人的扮演，在舞台

上替各种不同身份、个性、抱负、遭际的人物发言抒感，发论抒情，表达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的口吻与心声！正是这种与传统“诗教”相悖的新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令知识分子大胆、热情地投入元曲创作，在使它继续保持“土气息、泥滋味”的同时，又在艺术技巧上更上层楼。而宋代由于缺乏这样的社会条件，所以柳永稍一偏离儒家的“正轨”，走大众化路线，即被排斥贬抑，鸣鼓而攻；民间初生的戏曲——南戏也因不为士大夫所重而长期停留在较低的艺术水平；而“词”这种文艺样式亦终不能充当“剧曲”，走上宋金杂剧舞台，作为重要的表演手段，促成中国成熟的古典戏剧——“戏曲”早日诞生。

由于宋、元两代的社会政治、文化条件存在如此重大的差异，所以宋之柳永与元之戏曲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虽然才情相若，境遇相似（观关氏《[南吕]一枝花·不服老》曲可以概见，而且元曲家的生活比柳永还更要轻狂颓放），作品格调亦大致相仿，但前者（柳永）只能成为文坛上备受争议，甚至遭人诟病的词人，后者（关、马等）却名动天下，被人誉不容口，且举世无异词。语云：时也命也。其乃斯之谓欤？！

由此联系到另一相关的问题。对宋词艺术风格的划分，一般分为婉约与豪放两大流派，而柳永则被纳入婉约派中。这种“两分法”其实大可斟酌。柳永在宋代词坛是个“异数”，文人作者中，惟有他真正继承、发扬了民间曲子词的作风，因此，他可说是自成一派——“本色派”；而其他婉约与豪放两体的作者，都可统归为“文华派”（也可另起一个恰当的名称），然后再加以“二分”。

可见，对柳永的研究实有其非一般的意义。可惜，以往学

术界对柳永其人其词虽然都不乏兴趣,但真正能以多维视野,从社会文化学与文化传承学的广袤角度,宏观结合微观,加以全面关注与细密考察的,可说相当罕见(以本人所知而论,罗忼烈先生的《话柳永》与梁雪芸女士的《柳永词选》都是具精思睿识之佳作,而在艺术技巧的分析探求方面,梁《选》更有独到的发现),杜君此著的最可贵之处,就是朝这一正确研究方向迈出了大步。诚如专家评审意见所言:此书“从多学科的角度,全面探讨了柳永词在词史发展上的地位,以及其社会文化意义,视野宏通,论析细实,条理分明……有助于词学研究的深入”。

本书作者杜若鸿君毕业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却凭着对古典诗文的浓厚兴趣和聪慧悟性,锲而不舍的探究精神,打下了扎扎实实的文学研究根基。睿智的头脑经严格的法理、逻辑训练,再加杭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优雅环境的熏润陶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化雨春风的栽培,终于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就是眼前这部关于宋代词人柳永的有分量的著作。

常言道: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我曾有题山水画诗句云:“但只前行莫问源”,便说及这个意思。不过我更认为,只要努力耕耘,就必有相应的收获,所以又得句云:“但只前行自有源。”有位同学补充:其实在付出“耕耘”(也就是努力“前行”)的过程中,已不知不觉有所得了。

旨哉斯言!质之杜若鸿君,不知可有同感?

周锡瓊

二〇〇四年八月七日于香港大学中文系

自序：千年柳永研究的学术思考

词自唐发轫，经五代两宋下迄明清之千余年间，词家辈出，硕果累累。然而，毁誉之最烈者，则首推柳永及其词作。北宋以降，柳永向乃词评家评点之重心，宋代之《碧鸡漫志》、《能改斋漫录》、《苕溪渔隐丛话》、《乐府指迷》、《词源》，明代之《艺苑卮言》，清代之《古今词话》、《词苑萃编》、《词论》、《白雨斋词话》，以至近人王国维之《人间词话》等近一百处，皆对柳词各就一端，或褒或贬，或抑或扬，意见参杂。推崇备至者誉其为北宋正宗，并与杜甫诗相提并论；贬之极者，曰其淫靡之音泛滥六七百年而使雅奏从此断绝。

清末至今之百年词学纵向，关于柳永在文学史上的定位问题依然争论不休，柳词研究也不再局限于纯粹的文本研究，连带其思想人格皆成为评说的重要课题。对柳词的文本研究则始终正面剖析者多，未能兼其得失两面作出深入之探讨；对柳词的思想研究，往往未免夹有私人喜好，执于一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论者始把柳永之文化角色置于广袤的社会文化背景加以考察，得出较为中肯的评述。实则柳永词：珠玉之中，不乏错彩镂金之美；亦难免瑕疵其中，卑俗而不足论也。若偏于一隅，易得其鳞斑，而失其全貌。对于作家之评定如果只以文本为对象，亦难以得到令人信服之结论。文化学、

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和文献学等多维结合乃发掘作品丰富内涵的最佳法径，也是文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研究柳永词更应作如是观。正是以这广阔的学术和思维角度为基底，冀兼采古今学人之所议，弃其所短，扬其所长，搜纤靡遗，评鹭优劣，以见其瑕瑜得失之全面，从而最终为柳永及其词作一不偏不倚的历史定位，填补专家词研究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重要课题。

拙著立足于宏观和微观并举，理论和作品分析相结合，再参诸历代词话、笔记、类书和今人的散论与专著，综合比较研究，从文本研究为始点，而以论衡为终点，力求点面俱圆，去芜存菁，提出一家之见。

余研习柳词，始于对《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之酷爱，尔后积五六载之揣摩，搜汇资料，细大不捐，从感性至理性观照，方窥其一二。辛巳仲秋从香港大学赴浙江大学沈松勤教授门下，沈师上承夏承焘、吴熊和二位词学大师，学风严谨，尤善议论，聆听教诲，得窥古今词学之堂奥。以好之笃，故攻之勤，抉幽探微，终定以“论衡”名书，冀能融会千年来百家之说，以达致中肯、客观、全面的论断。复三载之功，几经增删，方成书付梓。虽谓望为柳永其人其词寻得阶段性的定评，然而蠡测管窥，资料杂多，未免挂漏，又学识浅陋，或前贤已有所述，或窞容幸误其间而不自知，祈望海内外专家学人，不吝赐正。

杜若鸿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八日于香港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序 一	邓昭祺(1)
序 二	胡可先(3)
序 三	周锡馥(7)
自 序:千年柳永研究的学术思考	(11)
第一章 柳永之生平与其“士”文化性格属性	(1)
第二章 《乐章集》思想题材之全面探讨	(18)
第三章 从柳永前代及同代之文风观其风格之形成 ...	(38)
引 言 风格兼采众体	(38)
一 花间遗风	(41)
二 白体遗风	(44)
三 敦煌曲子词	(46)
四 宋玉风流	(47)
第四章 柳永词之特色与瑕疵(上篇)	(50)
第一节 声律谐婉,挥洒自如而未定格律法度	(51)
第二节 句式有法,文采风流而病其浮嫫冶艳	(58)
第三节 槩诗用典,融化不涩而病其浅露俚俗	(66)

第五章 柳永词之特色与瑕疵(下篇)	(74)
第四节 描写物态,情景交融而多有重复吟咏	(74)
第五节 铺叙备足,文脉一贯而病其率直无味	(81)
第六节 悲欢离合,曲尽其妙而病其陈腔滥调	(93)
第六章 柳词的情感主线:“痴”与“狂”的结合	(103)
引言 柳永对“痴”与“狂”之私淑	(103)
一 “痴”“狂”意涵	(105)
二 柳词中的“痴态”与“狂情”	(109)
三 “痴狂”合一之深刻意义	(115)
结语	(117)
第七章 柳永词之雅俗及其整合格局	(119)
引言 忌俗尚雅之时代祈向	(119)
一 对柳词“俗”之评议	(120)
二 对柳词“雅”之评议	(126)
三 雅俗之并陈与超越	(129)
结语	(132)
第八章 儒家思想与柳词感伤基调之形成	(134)
引言 儒学与政治交错中的“士”悲剧	(134)
一 儒家理想人格模式:时代的追崇	(135)
二 理想和现实的二律矛盾	(138)
三 “志在当世”的忧患意识	(143)
结语	(145)

第九章 “柳永热”文学现象之探究	(147)
引 言 “柳永热”现象的特质	(147)
一 雅俗并陈	(152)
二 题材多元化	(158)
三 以“情”为尚	(159)
四 善择腔调	(160)
五 传播范式	(162)
第十章 柳永词“原生状态”发凡	(165)
引 言 柳词是“文学—文化现象”的典型	(165)
一 应歌言情:柳词大量“生产”的原动力	(166)
二 独抒性情:花间尊前的延续与新拓	(169)
三 强烈的时代气息:北宋社会升平的赞歌	(174)
结 语	(180)
第十一章 历代各家对柳永词之评议	(182)
第十二章 柳永在文学史上之地位及其影响	(193)
一 词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	(194)
二 革新词风的先驱者	(197)
三 贯通雅俗文学壁垒的桥梁	(199)
附 录 唐宋文学与文化研究专论	(205)
一 诗之“尊唐抑宋”辩	(207)
二 宋代科举与士文化	(225)
三 儒学与政治哲学交错中的“士”两极	(241)